

关于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思考

南京政治学院台湾问题研究所讲师 博士生 韩文琦

内容提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晚清台湾军事变革与大陆军事变革息息相关。笔者认为:“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动因;“师夷技求自强”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主线;台湾社会的综合开发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基础。晚清台湾军事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在日后的抗日保台斗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晚清 台湾 军事变革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腴物博,资源丰富,并且地处战略要冲。从17世纪开始,台湾就成为殖民者眼中不可多得的肥肉。夺取台湾不仅意味着可以占有台湾的资源,更主要的是能以台湾为侵略基地和战略跳板,进而吞噬与之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台澎设防的重要性。但直到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后,台湾在海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才引起清政府的重视。1884年中法战争后,清廷不仅对其海防战略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整,并决定设台湾行省。台湾的军事建设自此结束了以往基本依赖福建省的局面。这一决策表明,清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台湾作为维护大陆安全的重要战略要地。与此同时,晚清台湾军事变革迈开了沉重的脚步。

一、“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动因

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统一台湾起,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止,清政府领台凡210余年。在此210余年间,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对台湾的侵扰及台岛内阶级斗争、治安状况的变化,清政府基于对台湾在整个中国海防战略地位的认识,其台湾防务观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演化过程。应该说,直至1874年5月日本侵台事件爆发,清最高统治者的台湾防务观是“御外侮”与“消内患”兼而有之。“御外侮”主要反映在列强侵扰台湾期间,而“消内患”则是贯穿始终。但由于此时的清政府对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在国势日衰、沿海各地防务吃紧的情势下,对台湾的防务一直持消极态度,致使台湾防务松弛,军队日趋腐败。

日、法先后两次侵台事件,成为清最高统治者确立“御外侮”为主旨的台湾防务观的直接动因。1874年5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台湾,朝野震动。十年之后,1884年5月法海军进攻台湾,基隆陷,全台受困,牵动全局,“两宫宵旰忧劳,其时内外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ⁱ从全局考虑,清廷在谅山大捷后,决定“乘胜即收”,签订《中法停战条约》。两次侵台事件的刺激,使得朝廷内外重臣对台湾在中国整个海防上的战略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左宗棠指出:“就海防分言之,闽粤吴越楚齐及孤悬各岛,凡可收船寄碇之处均宜逐加查勘而豫为之防固也。然合七省同筹,则只此一海,如人之一身有气遂、血海、筋络、皮肉之分,即有要与非要之别。要处宜防宜严,非甚要处,防之而不必严,可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脊背,亟严为之防。以此始者以此终,不可一日弛也。”ⁱⁱ两江总督李宗羲认为:“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建、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罗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实为中国第一门户。”ⁱⁱⁱ

沈葆楨是 1874 年台湾防务建设筹划者，他认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iv} 这些大臣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是以奏折形式上奏朝廷的，并得到了清最高统治者的最终认同。1885 年 10 月 12 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v 划台湾为单一行省这一重大决策，是清政府在列强屡次侵犯台湾之后作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其基本着眼点是御外侮，以维护海峡两岸的安全。

清最高统治者最终认同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将台湾的防务重点由安内为主转向御外为主，这在台湾军事近代化的历程中有着决定意义。在一定的台湾防务观支配下，必然会进行相应的台湾防务建设。在“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指导下，清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台湾防务原则，即从维护中国东南海防安全之大局出发，确立台湾防务以大陆为依托，内外相继，实施“闽台联防”的防务原则。在台湾国防地位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的压力下，尽快增强防卫实力以御外侮，势必成为封疆大吏治台的重点。从沈葆楨、丁日昌到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加强台湾防务建设的实践中，勇敢地承认中国在军事方面落后的现实，认识到“师夷技”的必要，并采取实际步骤，推动了晚清台湾军事的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是推动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一个动因。

二、“师夷技求自强”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主线

两次侵台事件结束后引发的海防筹议中，朝廷权臣们在总结战争失败的教训时，再一次把焦点集中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再一次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对策。对于清朝统治集团来说，引进外国的先进武器，并不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直接有利于加强其国家机器，维护其封建统治。因此，晚清台湾的军事变革首先是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开始的，尔后拓展至编制体制、军事思想、作战方式等方面。综观这一时期加强台湾防务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可以看出“师夷技求自强”的核心思想是贯穿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主线。

(一) 引进装备，构筑适应近代海战的防务体系。台湾作为“孤悬海外”的海岛，若增强其军事实力，必须经营海口、加强海防建设。如何设防，实现“御外侮”的目的？沈葆楨赴台之时，正值日本侵台之际，他即派人赶赴欧洲购买铁甲船、水雷、洋炮、洋枪等西洋新式武器，装备驻台清军。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旗后等处修筑炮台，安放新式大炮，炮台内装备 5 尊 18 吨安蒙士唐洋炮，40 磅和 20 磅小炮各 4 尊，还有 100 余杆里明敦后膛洋枪。^{vi} 丁日昌在筹划台湾防务之初，曾经提出在台布置“中等铁甲船二三号”，修造新式炮台等建议，以加强海防。刘铭传上任伊始也曾想依靠海军来保卫台湾，“如能澎、厦驻泊兵船，防务严密，敌船附近，无可停泊，则不能飞越深入，不顾后路。”^{vii} 他曾奏请为台澎购置 4 艘铁甲快船，后又建议购买稍快的兵船数艘，期望在台澎建立一支水师。但因缺乏清最高决策层的支持，使得丁日昌、刘铭传等人终究没能建立起一支有一定实战能力的海军。但在刘铭传的苦心经营下，台湾除已有的一艘兵舰“海镜”号外，又先后添购了“威利”、“威定”、“飞捷”、“驾时”、“斯美”等兵舰商船，以满足台防及运输之需。同时，刘铭传采取了加强陆地防御力量，实施“以陆制海”的策略。在“以陆制海”思想指导下，刘铭传依据台澎地区所处地理和战略形势，把设防的重点放在澎湖、台北和台南地区，先后在澎湖、安平、旗后、基隆、沪尾五海口，仿西洋新法，修筑炮台 10 座，并安装从英国购买的后膛阿姆斯顿新式钢炮 31 尊。此外还购买沉雷 60 枚、碰雷 20 枚，以使“海防利器水雷与炮台相资为用”^{viii}。

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看到的。从上面的史实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沈葆楨、丁日昌、刘铭传这些朝廷钦命大员，将“御外侮”、提高台湾防务能力的着眼点放在“师夷技”、引进武器装备之上，不断地加强这些地区防御力量建设。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新的武器装备部队后，特别是新的兵种炮兵和新的军种海军的相继建立，必然会导致作战样式及军事思想的变革。在刘铭传确立了“以陆制海”的策略思想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台湾基本上建立了以陆地、海口防御为主，海上力量相辅助的近代化防御体系。在作战样式上，出现了海陆军协同的抗登陆作战；而且随着枪炮威力的增大，队形也由密集向疏散发展；对防御工事的构筑也引起了重视，出现了攻防结合的“地营”。

（二）师西法整军练兵，提高军队战斗力。日本侵台事件爆发后，钦差大臣沈葆楨针对“台湾营伍废弛”、落后的班兵制，严重地滞后于台湾战略地位对防务上的要求等情形，向清政府上奏提出“分汛裁撤”、“并营操练”、“汰弱补强”等整顿营制的方案。1876年11月，丁日昌“力疾渡台”后，提出练洋枪队、水雷军等加强台防的具体措施，后因丁去任而未能实现。刘铭传抚台后，及时吸取中法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台澎军政急宜讲求操练”。为搞好部队的训练和整顿事务，他照欧洲的方式和准军的营制训练军队，在台北设立营务总处，台中、台南两路设营务处，掌握军队的整顿和训练。练兵整军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变革军队的编制体制。即对绿营“汰弱留强”，“将无用的绿营冗兵裁撤下来，让他们担任盐务、厘金、邮政、地方保甲局和开山凿路事务。”¹⁸然后将剩余精兵重编为35营，分驻台湾各地。第二就是仿照欧洲的方式训练军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聘请洋人担任教官，依照西法训练经过整顿、且装备新式的军队。第三是严格考核制度。刘铭传规定，一年内对带兵的将领考查两次，考核包括枪法的准确程度和军纪的好坏等内容。第四是培养军队科技人员。他分别设立了电报堂、日学堂，培养了一批司报手、制器手及翻译各种日本情报资料的人员。另外，尤值一提的是，刘铭传已经开始着手创建一种与军事近代化相适应的后勤保障制度。如在台北创设官医局、官药局和养兵院，对驻台官兵实行免费医疗制；建立抚恤制和“存饷制”，等等。后勤体制的改革，对于稳定军心、振奋士气起到较好的作用。

马克思曾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¹⁹事实也确实如此。对原有旧式军队实行汰弱留强，改编成巡防营，便于新式军队机动作战，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事实表明，刘铭传“师夷技”、所实施的一系列整军措施，标志着晚清台湾军制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轨道。

（三）兴办军事工业，觅制器之器。台湾防军没有自己的弹药工厂，一旦子弹、枪械用罄，则需从大陆大量补充。有鉴于此，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决定在台湾本土设厂自己制造军火炮械。1886年3月，刘铭传就饬令记名提督刘朝乾会同淡水县知县李嘉棠在台北大稻埕建造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军事企业。在机器局的基础上，1888年8月刘铭传又建成了台湾大机器厂。这些企业以制造枪弹为主，兼理修造事务，技术水平也已相当高。此外，刘铭传于1886年在基隆同设立火药局，用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以供军需；又分别在基隆、沪尾两地设置水雷局和水雷营，专门制造和布设水雷。刘铭传之后的继任台湾巡抚邵友濂，尽管对刘铭传亲手筹划的多项台防措施加以收缩，但对台北机器局反而进一步扩充。显然，他对军火机器制造在台湾防务建设上的重要作用

的认识与刘铭传是一致的。这些军事工业的兴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基本上满足了台湾本地的军事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发展。因此，军事工业，作为“师夷技求自强”的结果，不仅推动了晚清台湾军事近代化的进程，在晚清台湾社会整体近代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台湾社会的综合开发是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基础

清政府确立“御外侮”的台湾防务观、设置台湾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东南防务，维护中国东南海防安全。因此，防务建设就必然成为沈葆楨、丁日昌、刘铭传等台湾大员开发建设台湾的核心内容。固本培源，着眼于发展对促进防务建设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能源、通讯、人才培养等事业，确立大防务观，建设大防务，是他们在台湾防务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限于当时客观条件的制约，刘铭传等人在治台期间，重点进行了军民兼顾、能够为防务建设提供资金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解决一些对防务建设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一）设置水陆电报。清代，福建远离京师，为一偏远省份。台湾与福建隔着大海，来往文报均用帆船及驿递。从北京发出的政令军令，从台湾发出的奏折，一般要经过 30 多天，方能到达。1874 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深感吃了信息不灵的大亏，一直反对架设电报线的态度发生了动摇。沈葆楨任内，曾倡议在台湾架设电线，兴办近代通讯业，还奏请架设一条台南至厦门的跨海电线和一条由厦门至福州的陆地电线。1877 年 10 月，丁日昌主持架设台南至安平、旗后的陆上电线，计 47.5 公里，同时设台南、安平、旗后电报局，于是年 11 月对外营业。这是我国自办的最早电讯业。刘铭传在指挥抗法保台期间，同样经历了文报延误而坐失战机的教训。中法战争一结束，刘铭传即派人赴上海，与洋商谈判，最终与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怡和洋行签订合同。1887 年 9 月，铺设台北沪尾至福州川石的 170 里电线，实现了福建与台湾省的电报联络。同时又铺设了澎湖至安平的 53 里海线。1888 年 3 月 13 日，陆路电报线接通。总计水陆设线 1400 余里。台湾电报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台湾与祖国大陆沟通与联系，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二）建设铁路。丁日昌是第一个提倡修筑台湾铁路者。上任伊始，他立即赴台进行实地考察，筹划台湾防务。考察后，丁日昌上奏清政府，提出“以练兵为体，轮路（即铁路—笔者注）、矿务为用”为主要内容的防务建设计划。他进而详细分析了“轮路矿务”在台湾防备建设上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历陈以往台湾因未办轮路矿务而对台湾防务所带来的“十害”后，又列举了“轮路矿务”在台防中的“十利”。在丁日昌的努力下，台湾铁路的修筑计划逐渐具体化，但终因经费缺乏而流产。刘铭传治台期间，继续奏请筑铁路。他通过赴南洋招商集资和国库借支等办法筹措筑路资金。为了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1887 年 4 月 13 日，刘铭传向中央政府报告了台湾铁路建设计划，针对顽固派反对修建铁路的种种谬论，奏折特别强调修建铁路除了便于驿务、垦务、商务以外，特别指出铁路的军事功效。1888 年 5 月 10 日，清政府正式批准台湾铁路建设计划。7 月 10 日，全台铁路商务局于台北大稻埕成立，翻开了台湾铁路建设史上的第一页。由于经费紧张以及清政府部分官僚的多方掣肘，刘铭传克服了重重困难，东挪西借，最终完成了台北至基隆和台北至新竹段的铁路修筑工作。从防务角度说，铁路的修成，“则调拨军队，朝发夕至”，²¹对于军用物资的转运也提供了便捷的输送方式。

（三）开山“抚番”。台湾长期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岛内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而少数民族所控制的范围甚广，如果不将番人纳入府厅县的管辖之下，全省的行政统一就难以实现。同时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

加深，列强对台湾虎视眈眈，经常利用民族矛盾，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沈葆楨深感开山“抚番”的紧迫性，并将此举与加强台湾防务紧密相联。继沈葆楨之后，丁日昌也将开山“抚番”、奖励移民作为治台的一项重点工作。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开始了更加积极的抚番工作。1886年，他在台北设立全台抚垦总局，自任抚垦大臣。下设八个抚垦局，局下再设若干分局。对于抚垦的官员，刘铭传慎重选用，并加以严格约束。对待番民的首领，刘铭传采取了既往不咎，令其将功赎罪，攻心为上的策略。为了巩固抚番取得的成果，刘铭传十分注意对于番民的教化工作，设立番学堂，学习中华文明，对于成绩优秀者还给以“番秀才”的称号。在番区进行大规模交通建设，加速他们学习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步伐。对于那些拒不就抚番社，则采取武力围剿的方式，迫使其就范。从沈葆楨在台主政，历经丁日昌、刘铭传两任巡抚，开山“抚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抚番工作的顺利进行发展了台湾经济、缓和了民族关系，杜绝了侵略者企图以此为契机的分裂图谋，巩固了台湾防务。

（四）学以致用的人才开发模式。台湾近代防务建设和产业开发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进展，是与刘铭传积极进行以人为本的人才开发战略分不开的。他有着与时俗迥然不同的人才观念。他认为官府必须使用和重新造就那些具备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认为主持军政的官员应该是通才。在抚台期间，刘铭传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开发人才的措施：一、设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这在以上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其次，不拘一格地擢拔人才，惟才是举。为了加强台湾防务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他甘冒风险，对于清政府已经明令永不叙用的有突出才能的人员，他照旧委以重任。对于一些有功的台籍人士，刘铭传也一视同仁，信任他们，给予他们实际的权力。三是借良才于异国，为台湾树人。他所借之才主要是外国籍的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些是侨居异国的华侨、商人、知识分子和具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他们一般对近代的科学技术比较精通，他们的到来为台湾近代防务建设及台湾社会的近代化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沈葆楨、丁日昌、刘铭传的领导 and 主持下，台湾近代化进程也开始起步，使得台湾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呈现蒸蒸日上之势。这样，就将台湾这样一个重要的军事堡垒的根基建筑在台湾社会综合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从而使台湾军事变革与台湾地区的综合治理、民用工业的发展相表里，同步进行。

晚清台湾军事变革还呈现出明显的跨越性特点。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近代化水平，其军事变革就要求较高的起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高起点只有通过“师夷技”才能实现。晚清台湾军事变革虽然是以大陆发起于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为范本，在方针、模式与方式的选择上以洋务运动为参照物，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开始其“师夷”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毕竟是洋务运动发展了十几年之后才开始的，因此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超越了大陆曾经以“练兵制器”为内容的单纯军事建设的起步阶段，从一开始就跨越到了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限于篇幅关系，不再详述。

纵观晚清台湾军事变革的历程，应该承认其取得成效是显著的，台湾军事近代化水平在当时冠于全国。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二十年的台湾防务建设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沦为日本殖民地，这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军事失败、外交妥协的结果。

注 释:

- ⁱ、《刘壮肃公奏议》：卷 2
ⁱⁱ、《台湾文献丛刊》：《道咸同光四朝奏议选辑》，第 71 页
ⁱⁱⁱ、《台湾文献丛刊》：《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第 264 页
^{iv}、《沈文肃公政书》：卷 5，第 4 页
^v、《清实录·德宗实录》（三）：卷 215，第 1023 页，中华书局，1987 年版
^{vi}、田珏：《台湾史纲要》，第 136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vii}、连横：《台湾通史》，第 641~642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viii}、《刘壮肃公奏议》卷 5，第 427 页
^{ix}、姚永森：《刘铭传传》，第 136 页，时事出版社，1985 年版
^x、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 1 卷，第 4 页
^{xi}、连横：《台湾通史》，第 368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

通联：(210003) 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 韩文琦
电话：025~83477390

(会议论文，原文印发，文中用语和观点系作者个人意见。)